振兴实业 金融再出发

编者按 /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珠三角拉开，至今已四十载。随着多层次资本体系的完善和新金融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意味着金融业有了新使命并开启新的征程。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经营报社、广州市金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振兴实业，金融再出发——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发展论坛5月31日在广州召开，共同探讨在新时代下，金融如何助力实体企业发展壮大；在下一个改革开放周期中，金融机构如何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变革新机遇。

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金融业站在继续改革开放新起点

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壮丽征程，中国经济总量从只占全球的不足5%上升至15%以上，并且推进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这期间，中国金融经受住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考验，不断探索着适应中国国情的金融开放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金融业也站在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高裕跃：广州需更有力地推动全面改革和开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对广东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40年前，改革开放从岭南大地起笔，改变了世界和中国，更加速了广州的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广州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未来高质量发展仍需要以更宽视野、更高要求、更有力举措推动全面改革和开放。

杨晓波：未来信托公司比拼的是主动管理能力

本报记者 万佳丽 夏欣 广州报道

过去十年，是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飞速增长的十年。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的信托资产总规模已经超过了26万亿元，信托行业成长为了当前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但同时，信托行业在这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业务模式不清晰、通道业务过多，资金在金融业空转等问题。

5月31日，在《中国经营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之金融发展论坛”上，安信信托总裁杨晓波表示，当下信托规模的任性增长不再见得是一件好事，甚至可能会与中国经济的走势与战略背道而驰。

杨晓波认为，如今，信托公司比拼信托资产总规模，事实上已经不再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可能意味着一定的风险。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是主动管理业务的规模和占比。

“原因很简单，只有主动管理，才能够发挥信托公司在实业投资领域的研究、管理、风控优势，充分利用信托业务的灵活性和敏锐性，并且通过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管理覆盖，承担更重大的受托责任，获得更丰厚的信托报酬。”

回归本源，脱虚向实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安信信托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55.92亿元，同比增长6.6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6.68亿元，同比增长20.91%，排名同行业第二；信托总收入52.8亿元，占到整体营收的94%，排名同行业第一。信托总资产规模达到251.26亿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杨晓波说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安信信托五年多以来对于主动管理业务的大力培育，与对通道业务的主动压缩。“从2012年末的174.3亿元，到2017年末的1585.1亿元，我们一直坚持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大力发展相关业务。去年，我们的主动管理业务规模达到了68%，且主要以投贷联动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

截至2017年年底，安信信托总资产规模251.26亿元，其中64%进入实业，24%进入房地产，4%进入基建。从收入结构看，公司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占比分别为94%和6%，公司信托业务收入占比高于行业平均。

同时，资管新规今年正式落地。资管新规中关于去通道、降杠杆的表述与规定也表明：监管层正在并将持续着力推进，让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为振兴实体经济服务。

在这一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繁荣发展之根基，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便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信托机构在资管新规的指引下，积极拥抱监管，着力解决以上提到的诸多问题，将有助于信托行业更好地回归本源，脱虚向实，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有利于信托行业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谋求自身业务的转型，跟上时代的脚步。

他认为，信托公司在引导资本进入实业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独特性，这是信托行业应该抓住、做精做细的好机会。

“信托公司在实业投资中的灵活性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投资当中，既可以是偏债类的借贷，也可以是偏股类的入股，甚至可以是股债结合。”杨晓波进一步解释道，“对于企业而言，‘股’能够提升公司的净资产，在不增加企业负债的前提下，甚至能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而对于信托公司来说，以灵活的形式，深度参与到被投项目的战略决策、日常运营、财务管理中去，则能够有效地降低风险，利用信托公司自身的专业能力，起到扶持和监督的作用。”

在主动管理业务中，安信信托尤其注重对于实业的布局。以基于产业的投资管理能力为基石，安信信托在近年来尝试拓展了诸多实业发展的道路，形成了包括现代物流、生物医药、互联网基础设施、城市更新、高端养老、现代农业在内的实业布局体系。

在信托资金实业布局方面，杨晓波也谈及安信信托多年来实践的经验。他表示，要与时俱进，真正构建基于产业的投资管理能力。与此同时，要把脉国家大政方针，从供给侧改革出发，以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出发点，优先进入与国家战略、人民生活具有强相关性的行业。“信托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专属捕鱼区’，在大资管时代的竞争格局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

据悉，安信信托的投资项目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从海南省的全球最大火龙果企业，到义乌现代的智能物流基地，从繁华城市上海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到青海荒原上的钾肥基地。从参与关切全国1亿糖尿病人的替代药物研制，到首创养老信托，力求协助解决老龄化问题。

在海南省的东方市，安信信托参与投资创立了中国最大的红心火龙果生产基地，名为北纬十八度果业。目前，北纬十八度果业已经拥有了1.7万亩的种植面积，拟发展规模达到7万亩，未来预计每年产量超过20万吨。

会上杨晓波笑谈道，有些朋友说，“你们安信信托有点‘不务正业’啊，火龙果也开始种起来了。但是这个项目帮扶了当地800余户贫困户，创造1000多个就业机会，恰恰是良好的产业扶贫实践，是最大的正业啊！”

风控是做好实业投资的基石

在互联网方面，安信信托通过参与投资互联网数据中心，助力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数据中心拥有很高的增长潜力，同时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可以预期，对于数据流量、存储的需求每年都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满足这种需求，则是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基石。目前，安信信托已经在上海参与了多个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投资建设。

在生物医药领域，安信信托参与到糖尿病药物研发、生产企业的投资中。中国目前有1亿糖尿病患者，其中大部分为II型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而中国的胰岛素药物市场却长期被国外药企所垄断，药物价格高成为影响患者身体健康与生活水平的瓶颈。安信信托响应国家政策，推出“安信健康系列”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医药健康领域，目前已设立项目用于支持胰岛素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企业，并已取得成果。

在现代物流领域，安信信托布局义乌，助力义乌市政府打造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推动新零售发展。安信信托投资的普洛斯义乌物流园由中国最大的现代产业园提供商和服务商普洛斯开发建设，占地面积396亩，建设可租赁面积达19万平方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在中国经济的新时代，物流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无疑将居于重要战略地位。

在高端养老领域，安信信托是信托养老的开创者。安信信托立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的趋势，开发出国内真正意义上第一款将金融服务与养老权益相结合的信托养老产品，通过这一产品，不但帮助老人做好财富保值、升值的工作，为未来的养老提供充足的消费资金，更是通过专业筛选、统一采购，与专业优质的养老服务供应商合作，帮助客户实现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高端机构养老的多种养老方式全覆盖。

尤其在城市更新的产业布局上，安信信托做出了前瞻性的规划与部署。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十分火热，而安信信托早在大湾区概念提出前两年，就进入了珠三角城市更新市场。杨晓波认为，对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来说，城市更新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城市更新不是建造新城，而是对于已经形成的城市格局进行优化，将旧城区通过更新的方式变成新的城市功能区，从而焕发新的城市能量。

据了解，安信信托在黄埔区暹岗社区全程参与投入的三旧改造项目是广州市首批全面改造项目之一，也是广州市发改委重点项目。该项目位于广州市“东进”重要发展战略区域——开发区科学城的中心板块，容积率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在深圳龙岗、罗湖，相似的城市更新项目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中。城市更新提高了城市土地使用集约水平，改善了城市形象及拆迁居民居住条件，具备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

而说到这些年在实体产业上布局总结出的一些经验，杨晓波感言道，“这些年我们通过实践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经验，一是团队，二是风控。”

在团队的组建上，杨晓波认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于我们布局的每一个实体经济产业方向，都必须组建起具有高度专业性的业务团队。“这对于信托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期的投入是巨大的。但如果要做好主动管理，做好实业投资，这条艰难的道路，便是必经之路。”

信托业务风险管控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充分尽调、科学评审、审慎决策和有效管理。他强调，“风控是做好实业投资的基石。”与通道业务不同，做主动管理，尤其是做实业投资，对于信托公司的风控是非常大的考验，收获越大，要承担的风险就越多。

魏杰：改革开放下一步 中国经济新布局

本报记者 易妍君 广州报道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的40年，中国的全面改革涵盖了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六大体制的改革。近年来，金融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塑逐渐成为重头戏。

未来，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将是大势所趋。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占社会融资规模接近四分之一，金融助力实体经济有着巨大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5月31日，在中国经营报社、广州市金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振兴实业，金融再出发——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对于鉴别新金融乱象、去杠杆解决路径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中肯建议。

分辨方向，警惕乱象

就目前金融领域存有较大争议的若干问题，魏杰阐述了独到观点，切中时弊。除了探讨金融科技、区块链等新金融现象，他也为社会整体负债过高、去杠杆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所谓金融科技，即指一些新技术进入金融领域，使金融业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最近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新技术进入后，究竟是带来了乱象还是引领了方向。”魏杰所提及的新技术主要是指互联网技术和区块链技术。

他认为，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牌照，却做了金融类业务。互联网进入金融领域之后，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互联网金融公司如果要开展金

融类事务，就应该把牌照和监管的问题解决好。“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与收益的分析，按照风险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用别人的钱需要被监管。”他强调道。

众所周知的是，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之后，产生了数字货币比特币。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乱象？魏杰指出，仍需观察一段时间，不过，目前所谓的数字货币比特币属于乱象。“因为区块链技术不管有什么功能，它进入金融之后没有改变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发货币，在这个原则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比特币就不是货币，充其量是高科技游戏”，他指出，区块链技术并不等同于比特币，应警惕有关比特币的炒作。

魏杰强调，区块链技术未来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不容否定，但具体将其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哪一部分仍需研究。实际上，以庞大的物理学概念作为基础才能理解区块链技术。也就是说，目前大家热衷讨论的所谓去中心化，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技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

去杠杆：结构性控制债务

魏杰也谈到了另外一大热门议题——如何解决整个社会负债太高的问题。

他认为，必须关注近期连续出现的债务违约带来的问题，即去杠杆，“现在我国的杠杆率已达到GDP的250%，非常之高。2018~2020年是中国必须完成去杠杆的三年，建议金融业重点关注去杠杆的问题。”

那么，怎么去杠杆？魏杰主要提出了两种方法：首先，结构性控制债务；其次，用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他认为，去杠杆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结构性地控制债务，重点又是国企债务和地方性债务。

“有三件事可以反映出我们对降低国企负债率的坚定决心。”魏杰说，一是联通混改，它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降低联通的负债率，国家宁可失去绝对控股权，也要把负债降下来；二是东北特钢违约重组，这一事件的解决显示出强烈信号，国家不再对国有企业负债进行刚性兑付，只是有限责任，不再有政府兜底，所以原则上，未来中国没有所谓保本的理财项目；三是今年准备搞债转股，国家拿出一笔优质资产要把负债降下来。

至于地方性债务，他指出，2016年、2017年地方政府潜在债务上升非常快，主要由PPP项目的积累和产业引导基金的发展这两个因素造成。

他还提及，最近通过调研发现，有的县级市财政收入一年才10亿，却在操作200亿的项目，经营风险正在不断增加，“所以今年要严格控制地方潜在债务，主要查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要严格控制这种产业债务的上升。”

另外，魏杰表示，今年要控制好两个政策：第一，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已经由过去宽松性转向了中性稳健，而从宽松性货币政策转向中性稳健货币政策的结果必然是出现钱荒、资金紧张。

第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过去顺周期发展了40年，这40年在不断扩张，不断加杠杆。未来三年，我们需要顺周期降杠杆；此外，顺周期降杠杆要防止市场得传染病，某一领域的风险一旦传染就会引爆金融风险，比如房地产市场，突然出现的房地产暴跌如果传给实体经济，就会引发危机，引爆金融危机。

他建议，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今年开始都需要“打隔断”。房地产市场方面，隔断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土地抵押和住房抵押做出新规定；防止资本市场出问题，则需要对股票质押的数量和价格做出严格规定。

组建国家产业基金，服务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反过来说就是实体经济对融资的要求，也决定了金融的发展方向和产品的形成，要看到目前的实体经济到底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魏杰表示，这仍需金融机构不断进行研究。

目前，实体经济最大的一个特征是存在技术短板，中国实体经济必将把技术创新作为重中之重。魏杰认为，中国这次技术创新要求的是颠覆性技术和原创性技术，而这种技术创新往往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而现有金融体制很难满足这种需求。

由此，他建议，目前的金融改革需要非常重要的制度实际，即能否组建国家产业基金，“今年开始，实际上已经开始调整基础设施投资，预算上会减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钱可以转向对技术创新的投资”。

他强调，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不能单单依靠国家，要调动全体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最基本的要求是稳定的回报，国家资金需要满足民间资本对稳定回报的需求，以调动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魏杰透露，“我们最近一再建议要成立国家产业基金，旨在调动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发挥国家信用、市场信用的办法来启动技术创新。”

基于此，他表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金融创新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需要根据中国实体经济的真实情况来创新。他建议，金融机构可以思考一下，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现状需要怎样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应考虑实体经济的需求。

高端对话》

安信信托总裁杨晓波：实业布局是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万佳丽 夏欣 广州报道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中，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模式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出现了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监管套利和通道业务盛行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乱象。在实业投资领域具有天然优势的信托公司在经济的转折时期，能如何发挥信托业自身特点，为服务实体经济做些贡献？

5月31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金融发展论坛”期间，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与安信信托总裁杨晓波展开了一场关于资管行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企业自身发展转型的对话。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中，中国金融行业伴随中国经济经历了再度腾飞与转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点。作为金融业从业者，你对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金融如何改变这个时代的现在与未来？

杨晓波：改革开放的这4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生长、壮大期。这40年的时间，中国的金融行业走过了其他国家可能要花上一百、两百年才能达到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创造了一大奇迹。

但金融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脱实向虚，高杠杆等。从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实践来看，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必然需要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重心相匹配。

以信托行业为例，信托行业之前走过的十年，是快速发展的十年。十年间，信托公司充分利用其业务的综合性、灵活性和敏锐性，有效弥补了传统信贷业务的不足，也逐渐通过多种类型信托产品的设计开发，建立起了资产管理领域的专业优势，成为了大资管时代中资产管理的中坚力量。

《中国经营报》：对信托行业而言，资管新规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杨晓波：资管新规的出台落地，是整个信托行业，乃至大资管行业所共同需要面对的新格局、新变化。它对原本分散监管的各类资管业务进行了统一的规范，而这种规范将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信托功能将由以融资功能为主，逐步向投资功能、风险管理功能、社会服务功能等领域延伸扩展，在资产证券化、慈善公益、绿色金融等创新领域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营报》：资管新规在降通道方面的引导与监管，对此前以通道业务为重要业务板块的信托公司而言有何影响？具体来说，给安信信托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晓波：事实上，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监管政策，体现了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的走向。随着国内宏观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实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扩大，信托行业自然肩负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谋求自身业务的转型。

对于信托公司来说，应该要有自己的“专属捕鱼区”，找到自己的特色禀赋。或是资产管理，或是财富管理，必须有一技之长。完全依靠通道的发展模式在未来一定会面临后劲不足、业务基础薄弱的情况，这是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的。

安信信托从2014、2015年开始，就着力规划、执行去通道的策略，大力发展主动管理业务。近几年，安信信托的通道类管理规模连年走低，2017年降低到了32%，也是历史最低。因此，在事先做了大量战略转型布局的情况下，资管新规的落地对我们的影响事实上微乎其微。

《中国经营报》：安信信托为何会选择以实业作为业务转型发展的突破口？目前公司布局了哪些实业？为什么选择进入这些行业？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杨晓波：目前安信信托实业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医药、互联网基础设施、养老产业、现代物流、城市更新、高端现代农业等。

我们给自己定位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实业布局。具体而言，在实业布局这个领域，目前整个大资管行业里，不存在与信托行业直接竞争的对手。不像固定收益业务，银行是毫无疑问的巨头，信托的生存空间相对有限；或是在标准化资产业务方面，信托要面临券商、基金等对手的挑战。

我们所投入的这些行业，其原则很简单：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地区繁荣，创造商业成功。因此，公司明确提出了以下的要求：禁止进入两高一剩行业；有选择的参与房地产项目，重点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城中村改造项目和保障房建设项目；优先支持信托资金以投贷联动的形式注入实体企业，优先扶持“三农”、中小微和科创型企业的发展。

说到经验教训，我想，长期深耕是在实业领域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始终坚定地在这些领域打造投资能力、提升风控能力、培育合作伙伴。安信信托在进入这些行业时，都组建了专业的行业团队与风控、合规评审团队。对于我们参与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的管理，并通过项目公司董事会层面制定的相关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实现其管理层的经营考核目标与公司对项目管理目标的一致性。

圆桌一》

实体、金融与科技如何共舞

本报记者 刘飘 何莎莎 广州报道

迈入2018年，金融严监管的基调不变，而“十三五”提出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开放金融市场。从内部发展和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都在共同要求金融业准备改革再出发。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迭代升级，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之下，金融科技企业在金融领域也在强势崛起。

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如何抓住时代的发展契机，如何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在中国经营报社、广州市金融工作局联合主办的“振兴实业，金融再出发——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金融发展论坛上，平安信托常务副总经理曹宁莉、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副总裁刘嘉、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林晓中、民贷天下CEO李海青、合众e贷首席运营官何伟君以及PPmoney万惠集团总裁办主任符皓就科技如何赋能金融提质增效进行了讨论。

主动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经营报》：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近年来金融监管的主流趋势。在新的经济形势和监管环境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曹宁莉：就信托业而言，要立足自身多市场、跨领域、财产独立性、风险隔离等的独特制度优势。一方面，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积极创新，采用债权融资、股权投资、投贷联动、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特色化、专业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围绕“三去一降一补”战略，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做好“加减法”，降低企业杠杆率，培育新动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林晓中：银行大量的金融资源还是投在了实体经济，包括农、工、商、服务、建筑、文化、旅游等行业。过去几年，在金融市场上做交易比做贷款来钱更快，所以很多人的注意力都放到金融交易上了。

最近国家的一些政策，对一些过度的金融交易行为进行压制，我们认为会很好地引导金融资源和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本源性的业务上。接下来，我们应该会更多、更好地去巩固好我们的本业，聚焦真正进行社会价值创造的产业。

李海青：我们是P2P网络借贷平台，我认为，政府层面的政策及监管的推动，说明这个行业的发展态势非常良好。

对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P2P平台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业务从点到面的改变。传统机构主要以点的方式去覆盖，而P2P网贷机构是以面的方式来覆盖，我们可以通过面的快速传播实现触及数千万的用户，所以我们要解决从点到面的转化。二是如何提高我们的效率。从服务100个客户到服务100万个客户的变化中，我们的产品技术、运营体系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何伟君：与其他的金融机构不一样，我们合众e贷更注重下游，为潜在用户提供消费借款，从而加大市场消费能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领域，我们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和大数据处理的能力，达到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让金融普惠到每一个老百姓。

符皓：众所皆知，GDP的拉动是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投资现在已经陷入到边际效益趋近于零的境地，而中美贸易战又会极大影响出口。至于消费，今年年初，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通过消费拉动GDP的增长。在此背景下，消费金融已渗透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吸引并支撑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和消费需求爆发，这也是PPmoney万惠集团很早涉足消费金融领域的原因。

《中国经营报》：在用户利润提升与服务实体经济之间，金融机构该如何选择？

曹宁莉：我们会与投资人积极沟通，让他们有效地进行风险识别及了解行业的情况，对金融产品有良性的认知，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平安信托肯定是将最优质的资产在一定的风险识别度内投资给最适配的投资人。同时，也会让投资人知道，投实体经济，要跟企业共同发展、共担风险。

《中国经营报》：实体经济的变化更多依赖于创新，目前银行在服务新的实体经济的阶段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林晓中：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创新项目的投入产出模式及投资回报方式都是新的，确实给银行带来了更多的评估难度。有很多的新项目，仅靠未来的现金流去还款，没有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保证，这是目前银行做这类项目融资时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银行需要去改善信贷技术。对于新经济，特别是对高端制造业和新的实体经济的支持方面，银行不会掉队，更不会缺席。

《中国经营报》：在多样化的金融业中，交易所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刘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交易所在其间发挥的更多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掣肘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原因包括风险识别困难、抵押物缺乏、现金流不稳定等。金交所可以通过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找到核心供应商，把它们引入整个供应链环节当中，在强监管的平台上集中披露各类信用及风险信息，进而让金融机构更好地识别风险，从而释放额度、实现融资。总体而言，交易所更多是协助这些中小企业，在更大的平台上、更完善的链条上，个性化地解决痛点问题，实现直接融资、信用交易，从而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落到实处。

科技促进金融新业态产生

《中国经营报》：科技如何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符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才导致新业态的产生。正是基于科技在金融中的力量，2012年PPmoney网贷平台正式成立，结合互联网便捷、高效、透明的特点，旨在成为给有理财需求和有借款需求的用户提供资金撮合信息的中介平台。

这是一个属于科技驱动的时代，技术创新成为实现数字生活的推动力。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机器算法等革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科技正不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对金融业务，包括营销、产品设计和风控，都起到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展服务半径的作用。

李海青：数千万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经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在大量服务这些群体的时候，科技解决了许多问题：一是获客。我们服务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体，这就需要通过科技手段，在网上实现“病毒式”的传播，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搭建，达到出借人和融资人之间的撮合。二是提高风控效率和效果，业务量太大，人工基本上没办法解决，必须通过科技的手段、智能的风控体系，也就是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输出一个模型、结果，结合更多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在线技术自动获得、自动审批等，通过技术来解决从点到面、效率的问题。

何伟君：我觉得金融科技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信息处理能力。以前我们只能是通过简单的二维数据，都是一些标准的数据。但是有更多的非标准化的数据可利用，比如说人脸识别、语义分析等，再结合信贷数据，我们才可以做到360度的分析，再做出准确的风险定价。二是效率。只有通过大数据去进行系统分析，我们才可以快速地实现放款和处理的速度，降低运营成本。

《中国经营报》：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在科技能力创新方面是否面临着困惑？

林晓中：事实上，从科技的应用方面，银行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银行是信息科技行业最大的用户。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需要克服的短板是场景化的问题，即对于社会上产生的一些新的金融需求，能否迅速采用科技手段完成商业模式转换？目前这方面有短板，需要通过改善管理机制来提升能力。

曹宁莉：我觉得科技可以分为信息科技和智能科技，前五年，大家布局信息科技，现在在不断完善。最近几年，大家聚焦智能科技，不断地在想办法如何去应用场景。平安信托在所有产品的生命周期上都有一个信息化的管理。这几年，平安信托也一直对主动管理能力进行提升，特别是在科技的应用，我们集团在生物识别、区块链、AI、大数据、信托云等方面进行布局；在智能方面，我们应用了KYP，即充分地了解你的融资客户，对融资客户进行企业风险画像，以及对其财务进行真实性的研判，经过自身的大数据，主动向我们的团队、客户去推送他想选择的产品和资产的智能合同。根据全流程的管控，包括产品的退出、在资金端对客户分层的智能服务以及智能投顾，如何让不同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人买到其风险适配产品等，我们都加以应用。

圆桌二》

金融新战场：数字财富管理市场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随着资管新规的逐步落地，百万亿规模的资管行业正式进入大资管时代。新的经济形势下，资管新规的落地对各金融机构将有何具体影响？未来新的投资风口在哪里？

在5月31日举行的“致敬改革开放40年——经济新时代的金融新使命”论坛上，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产品净值化、打破刚兑政策的逐步落地，投资者对风险认识也在提升；在财富管理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多的资金将进入资本领域，未来的资本市场，新兴制造业、吃喝玩乐等领域都将是风口。

包商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杨久龙认为，随着资管新规的逐步落地，资管业务将更加规范。之前资管业务存在层层嵌套，一种金融产品嵌套到另一种资管产品开展业务，存在监管套利和空转套利。资管新规明确提出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同一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适用同一监管标准，更有利于打破监管套利，破除层层嵌套。

资管新规指出，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要求监管部门对资管业务实行平等准入，促进资管产品获得平等主体地位，从根源上消除多层嵌套的动机。同时，将嵌套层级限制为一层，禁止开展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资管新规强调，实行穿透式监管，对于多层嵌套资产管理产品，向上识别产品的最终投资者，向下识别产品的底层资产（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此外，资管新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打破刚兑。根据新规要求，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明确刚性兑付的认定及处罚标准，鼓励以市值计量所投金融资产，同时考虑到部分资产尚不具备以市值计量的条件，兼顾市场诉求，允许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

小牛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思甥指出，早在2013年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已提出了对资管领域进行主动管理，但直至资管新规正式出台，其主动管理部分才真正得以推行。“尽管打破刚兑已成必然趋势，但随着保本理财产品的逐步退出，结构性产品备受欢迎，也出现了很多假结构性产品。”

现在的零售存款还有65万亿元，12万亿元的公募基金中有8万亿元是货币，只有不足1万亿元是偏股型的。邱思甥认为，目前投资者对保本型需求仍然较强，要完全打破刚兑仍然任重道远。

不过邱思甥看来，中国的大众财富管理可能还在萌芽阶段，不过私人银行却可以成为练兵之地。他指出，以财富管理业内领先的招商银行为例，据其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招商银行零售客户总数达1.066亿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总零售客户比只有2%。从整个行业来看，全中国在银行中日均资产超过50万元的客户占总零售客户比不超过2%，超过100万元的占比可能只有1%，甚至更低。目前这一客户规模还在扩大，这个市场仍在起步阶段。

在邱思甥看来，随着高净值财富人群结构的变化，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和投资理念也在转变，更多的资金将进入资本领域，未来的资本市场，新兴制造业、吃喝玩乐等领域都将是风口。

日前发布的《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科技驱动、铸就信任、重塑价值》（以下简称《报告》）指出，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财富管理数字化趋势不可逆，中国具备极佳的数字财富管理发展基础，未来有望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数字财富管理市场。

杨久龙表示，金融科技正在重塑金融业生态，新技术的运用驱动银行在运营模式、产品服务等方面的革新，降低运营成本，推动银行资金周转、投资等产生更高回报。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业是一个大利好。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一个挑战，这一挑战并非来自于小而散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而是来自BATJ等互联网金融巨头。

在与互联网巨头竞争中，银行也有着其自身优势。“从资管业务来说，互联网金融巨头也在开展互联网理财，但银行的理财产品线更加丰富，在优质资产的识别和获取能力方面更有优势。”杨久龙如上表示。

杨久龙认为，近年来，为适应新的挑战，银行也在加快拥抱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步伐，借助新技术提升自我核心竞争力，包商银行就下设专业团队，发力于金融科技的实际应用。